

从永定河传说看独具特色的京西文化

刘锡诚

永定河这条古老的河流，历来被称为北京的母亲河。有着3000余年建城史和850余年建都史的北京，其发祥之地，就在永定河从晋北群山中奔涌而出形成的冲积扇和古渡口一带。有了永定河，有了沿河而居的先民，就有了关于这条河流的种种传说故事。

永定河的传说既是古老的，也是新鲜的。在如今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城镇化的时代浪潮中，永定河的传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永定河的传说”于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标志着在永定河流域里流传的系列民间传说群，从此在国家层面上得到了认同和保护。

永定河文化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地域文化。《尚书·禹贡》、《山海经》等古文献中，记载了大禹治理的绳水（桑干河的古称，下游即永定河）以及绳水所出的碣石之山。有注者说，碣石之山即今之石景山。2000多年前春秋时期的“雅乐”，即使在当今时代，也可在北京千军台、庄户村等地传承的古幡乐中或隐或显地保留着一些成分。在今柏峪村的秧歌戏里，仍保留着金元时期的曲牌。在多种文化交融的永定河文化中，也包括了大量民众以口头的方式创作和传承的有关永定河的传说故事，这些传说故事包括神话传说、史事传说、人物传说、风物传说、生活故事等，奇特地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记述了永定河的灌溉之利、泛滥无常、决堤改道以及治理的种种史迹，讴歌了永定河流域的

人民艰辛创业的历程。

综观永定河的传说，不论是直接反映河水泛滥和治理工程的，还是反映流域内的人物、史事、风物、村落和日常生活的，几乎所有的传说都留下了历史的影子。传说的创作和传颂，在其初期，总是以史实和人物为依据的。

以史实、人物为依据、为由头、为核心的传说，在永定河的传说中所在多有，从而形成了一个坚实的现实主义的传说传统。传说以史实、人物为依据，不等于一成不变地把史实搬到传说中。传说之被创编出来，一定是经过了创编者从自己的价值观出发的个性化的选择、剪裁、创造和重铸，而在其后的传承和流传中，又会因时势、价值观、审美观等的变迁而发生嬗变，但不管怎样嬗变，其核心、其原型、其母题，还会存在于传说之中。杨家将的传说，如《龟神庙的传说》，在永定河流域也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传说里所写的神龟助杨六郎渡河的情节，折射出永定河沿岸老百姓的人心向背。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杨家将这一带的英勇奋战，并留下许多遗迹，是不会被老百姓创作出那么多民间传说的。以刘伯温为主人公的传说，流布于大江南北许多地区，而在永定河流域流传的《高亮赶水》、《刘伯温与麻峪村的暗河》等传说中，则把刘伯温建北京城的史事，移植到永定河文化的背景中，尽管糅合了不少神怪的幻想和奇异的色彩。《王老汉栽种河堤柳》的传说，与历代治理永定河时栽种堤柳有关。《冯将军严惩老兵痞》更是以冯玉祥治理永

定河的史实为依据的。

永定河的传说，作为永定河流域地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上述与水有关的传说以外，我们也欣喜地读到一些在固有的原型上拓展、虚构性比较明显的传说作品和近似于寓言、带有训诫意义的作品。前者如《避水的金鸽子》，读来似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南蛮子憨宝型的故事；后者如《刘九和叭嘎的故事》，读者读后得到的启示是：天上地下，任何事情都不能乱来，都要遵规守矩。

地方风物传说和解释性的传说，在永定河的传说中占有很大分量。地方风物传说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名片，是当地老百姓对自己生活的地方津津乐道、引为自豪的故事。如卢沟桥的传说、石景山的传说等。这类传说，又往往与历史上的名人轶事相联系，也就在知识性之外，陡增了几分趣味性。与地方风物传说相类的，是一些解释性的传说。一个村落、一块石头、一段堤坝，都会被人们附会上一段故事。无论从日常生活的知识结构说，还是从百姓的审美立场说，这些解释性的传说都是别有天地的。譬如一些古村落的名称由来传说，不仅给读者提供了相关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知识，填补了地方志民俗志的不足，而且往往再现了一段生动真实的地方历史。如《浑河的传说》、《军庄的传说》、《珠窝村和碣石村的来历》等，都是一些妙趣横生的口头艺术作品。

土特产的传说大多是解释性的传说，如金把黄（《金把黄的由来》）、姑嫂草（《姑

嫂草的传说》）、轧花苗（《轧花苗与喇叭花》）等。讲述这些土特产的传说，都带出一个美丽而凄婉的故事。最令笔者动情的是《轧花苗与喇叭花》，表面看是一个解释性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典型的“继母型”故事。在中外学者的研究中，继母故事以灰姑娘故事最为有名，但中国的继母故事则情节多样、业态万方。受继母虐待的轧花苗（花丫儿），并不是跳舞丢了玻璃鞋，而是被继母赶出了家门，最终指月为媒，与她所爱的青年成婚，过上了幸福生活。

永定河的传说是丰富的、多样的、多彩的，构成了一条民风独具的京西文化走廊。作为北京文化的母体文化，是现代北京所不能舍弃的。但作为主要流传地区和保护主体的石景山区以及与之相邻的其他区县（如北京门头沟等），在当今的现代化时代背景下，正在从过往的“京西骆驼古道”文化角色，急速转变为北京“城市功能拓展区”中的“中央休闲区（CRD）”，农耕文明背景下的永定河民间传说正面临着生存条件急剧下降乃至丧失的困境。我们一方面希望能给永定河传说的活态传承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氛围，尽我们当代人的力量使其传承下去，另一方面，我们也期望刚刚由石景山区文化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永定河的传说》所载的文本，能够发挥“民间文学第二生命”的作用，使更多的读者阅读，在更大的范围里传播和传承。（本文为《永定河的传说》序，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作者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各地



近日，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清河镇阳城村举办“高跷走兽”闹新春民间社火表演活动，吸引了众多村民前来观赏。“高跷走兽”以两人踮高跷连体进行表演，人与“兽”巧妙组合，演绎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是一种罕见的民间表演艺术。新华社发（薛俊摄）

河南安阳又闻林州四股弦

娱乐方式的改变，这一艺术形式前些年几近失传。2011年，林州四股弦入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林州市新艺四股弦剧团于去年8月正式成立，该团不断挖掘整理流传在民间的传说故事，经过加工后改编成四股弦地方小戏。

林州四股弦的主要伴奏乐器为四胡，因其有四根弦，所以得名四股弦。林州四股弦主要流行于冀南、豫北和鲁西北广大地区，使用当地方言演唱，行腔吐字高亢激昂，具有非常浓郁的地方特色。其主要剧目有《忠保国》、《拴娃娃》、《贺后骂殿》、《斩姚琪》、《二进宫》等。林州四股弦从诞生到现在已有近200年的历史，由于社会发展和人们



宁波积极恢复和发展四明内家拳

海曙区是浙江宁波的老城区，这里是浙东武术文化的代表——四明内家拳的发源地。近年来，在当地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四明内家拳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成为宁波的传统文化品牌。

四明内家拳蕴涵丰富的浙东文化，当地民间流传着各种版本的内家拳拳手致富济贫、抗倭保土等传说。近年来，宁波大学教授张如安、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周伟良等组成了四明内家拳专题课题组，挖掘、梳理该拳种的内涵。为了推广这一传统武术，四明内家拳传承人、海曙区政协主席夏宝峰分别在五乡中心小学、北仑泰河中学、宁波大学等学校授课，其中五乡小学已将内家拳作为晨操项目，全校学生人人都会打内家拳。目前，四明内家拳已入选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地正在积极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王友唐）

唐山非遗展演为市民奉上节日大餐

唐山市抗震纪念馆广场上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由唐山市群艺馆举办的“欢天喜地闹元宵——唐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在这里举行，为市民奉上了一份节日大餐。

此次活动为“2011年唐山市迎新春社会文化展演”的内容之一，为此，唐山市群艺馆精心挑选了评剧等一系列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文艺节目。演出现场，演员们

冒着寒风，用优美的舞姿和嘹亮的歌声表达了对幸福生活的赞美之情，演出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据了解，从正月初五至十五，来自唐山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唐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唐山市群众艺术馆等9家单位的演出队伍为市民献上精心准备的特色演出9场，参演人数500余人，吸引了近万观众到场观看，丰富了市民的节日生活。（唐心）

印象

水乡社戏：越地风情扑面来

余声

浙江绍兴境内河道密布、湖泊众多，素有“水乡泽国”之称享誉海内外，这为水乡社戏的孕育、成长、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丰饶的土壤。2008年，水乡社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社戏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为了农业性的生产祭祀而表演的节目。在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经历了各种艺术表演形式无数次的积累和融合后，绍兴的社戏在宋元时期与戏曲紧密结合，使祭祀活动与戏曲表演正式结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形成了一个“社—祭—戏”相统一、相融合的过程。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写下了《社戏》、《无常》、《女吊》、《门外文谈》等多篇有关水乡社戏的文章，回忆自己少年时代看社戏的情景，勾勒出绍兴水乡社戏的动人形象，绍兴的社戏才真正引起世人关注，并蜚声海内外。

舞台是演出的重要载体，水乡社戏的舞台在历史上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庙台，一般正对着大殿和神像；二是祠堂台，是设立在宗族祠堂内的戏台形式；三是河台（水台），这是充分体现绍兴地区水乡特色的一种社戏戏台形式，一般称之为“水上舞台”；四是街台，它是城镇中演出社戏时经常使用的一种舞台形式，一般都设立在比较繁华热闹的地区，比如人流密集的街心或路口；五是草台，临时于旷野或广场中搭起的戏台，而在舞台上演出的社戏，

也称之为“草台戏”。

一到社戏开演时节，众多的小摊贩就会聚拢在社戏台下，形成了一个临时性的集市。旧时，社戏会非常热闹，售卖小商品和各种吃食的摊贩众多。而社戏演出的几天，是孩子们最为开心的日子，可以向父母索要零花钱，到会中购买自己喜欢的零食或玩具。即使是现在的社戏演出，也往往能形成可观的社戏集市。

在社戏演出时，绍兴群众还有一个习惯，就是邀请自己的亲友来看戏。过去农村难得有看戏的机会，因此一到演社戏的时候，往往会向亲友发出邀请。亲友们来到时，家家户户都要杀鸡宰鸭，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操办，这样的风俗也延续至今。社戏在绍兴已成为仅次于春节的一项民俗活动。

作为一项民俗活动，社戏的传承是群体性的，绍兴一带的民众都已经把社戏当做生活中的一部分，自觉地世代传承，积极参与其中，或是组织策划，或是广为宣传，或是亲身参与、观看，可以说人人都是传人。目前，绍兴各村各镇在重大节日或特定时节往往邀请浙江绍剧团、绍兴小百花越剧团演出社戏。以越剧的诞生地嵊州市为例，该县有民间职业剧团数十个，他们仍活跃在绍兴各城镇和乡村，以社戏的演出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而他们的演出又极大地丰富和活跃了农村的文化生活。



元宵节临近，山东省聊城市民间花灯艺人正抓紧时间赶制各式花灯，准备参加当地元宵灯会，喜迎佳节闹元宵。图为民间花灯艺人李凤英在制作花灯。新华社发（张振祥摄）



设计跟不上时代 门神在城市消失

据新华社消息（记者刘怀丕）“从我记事起，我家就没有贴过门神，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信那一套？”“80后”湖北武汉市民王婵说，她很小的时候还见过有邻居贴门神，现在邻居家也没有贴的了。

“大多数城市家庭过年不贴门神了，一是因为很多人把贴门

神视为封建迷信，也有现在城市居住环境没有给贴门神留空间的原因。”山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常嗣新说，门神年画设计呆板、创新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也导致市民不愿贴。

山西民俗学会副会长张余认为，贴门神是一种传统习俗，是传

统春节众多仪式中的一个部分，与封建迷信无关。“现代人把很多过年的仪式简化了，当然体会不到年味了。”“贴门神的年俗没有过时，过时的是多年不变的呆板设计，如果能设计出符合现代人审美需求的门神新形象，一定还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张余说。

讲述

锣鼓行里的拼命三郎

——记晋南威风锣鼓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振湖

董文达

新年期间，山西临汾锣鼓广场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临汾市锣鼓大赛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一支支锣鼓队轮番上场，那宏大的场景、威武的阵容、火热的激情，给人一种荡气回肠的震撼。评委席上，一位老人的眼里满含泪花，古铜色的脸庞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他就是年近八旬的晋南威风锣鼓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振湖。

晋南威风锣鼓是诞生和流行在山西临汾一带的民间传统打击乐。王振湖的老家山西省翼城县文化遗产极为丰富，尤其是花鼓文化闻名三晋，至今当地还流传着一首民谣：“正月初一到十五，翼城东南西北走，百岁老翁五岁童，花鼓打得震天响。”王振湖从小学开始就是花鼓队的追星族，花鼓艺术从小就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

晋南威风锣鼓是诞生和流行在山西临汾一带的民间传统打击乐。王振湖的老家山西省翼城县文化遗产极为丰富，尤其是花鼓文化闻名三晋，至今当地还流传着一首民谣：“正月初一到十五，翼城东南西北走，百岁老翁五岁童，花鼓打得震天响。”王振湖从小学开始就是花鼓队的追星族，花鼓艺术从小就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

1957年王振湖进入山西大学学习，在校期间，他学习极为刻苦，《中国古代文学史》、《民间文学概论》等课本被他翻得散了架，只好用绳子串起来。4年的大学苦读，为日后他从事文化工作和相关研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大学毕业后，王振湖被分配到文化系统工作，从此一生与文化相伴。担任临汾市文化局副局长时，他十分注重临汾民间艺术的发展。为支持蒲剧和眉户戏的发展，王振湖经常深入剧团，通过个别谈话、开座谈会等形式，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使临汾的戏曲文化呈现出了万紫千红的局面，蒲剧演员任根心、郭泽民等先后荣获梅花奖。王振湖还和殷国富、宋庆云等指导完成了《浮山县民间文学集成卷》、《襄汾县器乐曲集集成卷》。不过，王振湖本人最钟爱的还是晋南威风锣鼓。自上世纪80年代担任锣鼓协会会长至今，王振湖一直在为威风锣鼓的振兴和发展奔走、呐喊。由于他一心扑在锣鼓上，因而被人们称为锣鼓行里的拼命三郎。

造等产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说到这里，王振湖滔滔不绝，甚至手舞足蹈，充分展现出他对锣鼓文化的热爱。为使威风锣鼓这一古老艺术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王振湖想了许多办法。他借助锣鼓协会这块阵地，多次组织各种锣鼓大赛，为各个参赛队伍提供相互切磋和交流的平台，使临汾的锣鼓艺术水平快速提高，锣鼓品牌知名度骤增。

多年来王振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每遇大的集训，他总是和队员们同吃、同住、同训练，常常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队员们吃一份苦，他要吃三份苦。随着年龄的增大，王振湖脸上爬满了皱纹，两鬓增添了白发。人们劝他悠着点，他笑笑不改初衷。有次在洪洞训练时，他突然病倒了，昏睡了一天一夜。醒来后人们劝他多休息，他却又出现在训练场上。在训练中，王振湖和同事们既遵循传统又大胆创新，不断赋予晋南锣鼓鲜活的时代元素。他还十分注重对队员整体艺术素质的培养，向他们宣讲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激发了队员们打好锣鼓的自觉性。

1995年王振湖退休了，按说该享享清福了，可他仍然一心扑在锣鼓事业上。孩子们在深圳工作，老伴儿带孙子一去就是6



王振湖(左)在指导队员打鼓

年。其间，儿女们多次让他去深圳，他总是说：“我的事业在临汾，我不能当逃兵。”王振湖一个人留在临汾，跑市场、搞比赛、办训练班，整天风风火火，忙得不可开交。锣鼓协会是一个民间组织，每次搞活动，经费缺乏是头等大事。为此，他东奔西跑，说破了嘴，跑断了腿。多年来，王振湖省吃俭用下来的钱都用到锣鼓事业上了，他常说：“为了威风锣鼓的传承，什么样的苦我都能受。”王振湖还痴迷于对威风锣鼓的渊源、曲谱、音乐、服饰等的研究，编著和出版了《威风锣鼓》、《威风锣鼓的保护》等一系列鼓乐专著。2009年，王振湖被命名为晋南威风锣鼓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大学同学为他举行庆功会，王振湖手捧酒杯，动情地说：“能为威风锣鼓的振兴和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足矣！”